

# 乾嘉分派的学术史建构

李福临 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乾嘉学术是清代学术的中坚,因其地域、治学特点等方面的不同,又可分为不同学派。这种学术分派是在近代学者的不断构建中逐渐形成的。章太炎首揭其彙,将乾嘉学术分为吴学、皖南之学;之后刘师培又进一步阐发;梁启超以“吴派”“皖派”来划分乾嘉学术。其分派问题终成定格。钱穆则从学术发展的视角切入,提出了“吴皖非分帜”的观点,将这一问题推向深入。

在今人的印象中,提起清代汉学,映入脑海的便是吴派与皖派。其实这种学术分类是在近代学者的不断构建中逐渐形成的,并且又有提出商榷性意见者。本文旨在考察近代学者关于乾嘉分派的学术史,以期说明近代学者关于此问题研究对现今研究的重大影响。此处的“近代学者”主要是指20世纪前半期的一些学者。

说到清代汉学,其治学范围不外乎音韵文字、名物制度,其治学方法也集中在校勘考订、训诂辑佚方面。当然,就学者自身而言,由于治学风格、目的不同,所处地理环境、社会风俗影响不同,治学肯定有所差异。乾

嘉学派代表人物戴震曾比较自己与惠栋治学的不同:“定宇求古,吾求是。”乾嘉学派后学江藩作《国朝汉学师承记》,该书八卷,依据汉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对清代汉学进行梳理,“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以此为据安排卷秩,卷一至卷八讲清初学者;卷二至卷四介绍吴地的“三惠之学”以及师承者;卷五至卷七讲皖地的江永、戴震继惠氏而起以及师承者。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清代学者已经看到了汉学内部的治学差别,但是并没有因此而划分出不同派别。同样,江藩写该书目的是表彰汉学,并没有关注乾嘉

学术的分派问题,更没有提出吴、皖派别,但该书的卷次安排确实对后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 ● “吴”与“皖南”

20世纪以后,章太炎的《清儒》是近代学人首次论述清代学术史的文章,也正是在该篇中谈到了乾嘉学术分派问题。章太炎言:“其成学箸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也。”惠栋弟子如江声、余萧客、王鸣盛、钱大昕及再传弟子江藩等治学或“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己

见”或“陈义尔雅，渊乎古训是则”。皖派学风不同，“震生休宁，受学婺源江永。治小学、礼经、算术、舆地，皆深通……弟子最知名者，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凡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缜密严饬，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苏州诸学殊矣。”章太炎认为皖派能在广泛搜集材料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论断，具有创造性，其治学条理严密、见解精到。他还指出地理环境对学风的影响，“及戴震起休宁，休宁于江南为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学深邃，言直核而无温借”。这是近代学人最早对考据学派别的界定。

从时间前后关系以及章太炎对乾嘉学术的分派“吴”与“皖南”来看，其的确是对江藩“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的继承。但是章太炎从学术特点、师承源流以及地理环境等方面出发，辨析了吴、皖之别。除了《清儒》篇外，在与其他人论清代学术时亦言：“铨次诸儒学术所原，不过惠、戴二宗。惠氏温故，故其徒敦守旧贯，多不仕进；戴氏知新，而隐有所痛于时政，则《孟子字义疏证》所为作也。”因此，梁启超言：“吴皖派别之说，出自江氏《汉学师承记》，而章氏辨之尤严。”

### ● “吴越之儒”与“徽扬之儒”

继章氏之后，刘师培撰文进一步阐发章太炎此观点。刘师培指出：以治经为主的汉学自清初顾炎武、张尔岐等开创之后，到武进臧琳“闭门穷经，研覃奥义，根究故训”。这是清代汉学的开始。之后，刘师培叙述了“三惠之学”，并指出惠栋治学“确宗汉诂，所学以掇拾为主，扶植微学，笃信而不疑”，梳理了“掇拾之学”的传承。论述完惠栋一系的学术师承之后，刘师培开始阐述“徽歙之地有汪绂、江永”等学者的学术，戴震之学出于江永，并将其“声语音韵历数之学”发扬光大。针对戴震治学，他指出：“曲证旁通，以小学为基，以典章为辅，而历数音韵水地之学，咸实事求是，以求其源。”接着详细阐述了“徽

歙之士”的师承传授关系以及成绩，诸如：治韵学者，前有洪榜，后有江有诰；治《三礼》者，有凌廷堪及三胡；戴氏施教燕京后，声音、训诂之学传于段玉裁，而王念孙所得尤精；典章制度之学传于任大椿。任大椿之学传于顾凤毛，焦循、凌廷堪从顾凤毛游，阮元之学得之焦循、凌廷堪，又纪昀笃信戴震之学，因其地位较高，大量接纳汉学之士，故戴学越来越兴盛。

从刘师培的论述来看，乾嘉时期的学术基本上可以分上两派。《南北考证学不同论》中更是详细辨别了江南吴越之地学者与江北皖南之地学者治学的区别。他指出，吴越之地学者，特别是惠栋、余萧客、江声、钱大昕、王鸣盛等学者的学术属于“摭拾之学”或“校勘之学”。皖南学者以戴震为最著名，戴震之后，其学者各以“其性之所近”而有专攻，学术传承到扬州，以扬州最盛。在论述完江南、江北学者的学术之后，刘师培得出结论：“今观于近儒之学派，则吴越之儒功在考古，精于校讎，以博闻为主，乃深芜而穷其枝叶者也；徽扬之儒功在知新，精于考据，以穷理为归，乃简约而得其菁英者也。”可见，刘师培所言遵从章太炎，从治学方法、治学目的等角度来区分吴派与皖派，虽然对乾嘉学术派别的划分以及评论与章太炎大体相同，但是论述较之章太炎要详尽些，对章太炎所论不无补苴罅漏之功。

### ● “吴派”与“皖派”

章、刘对乾嘉学术分派问题或言“一自吴，一自皖南”，或论“吴越之儒”与“徽扬之儒”，但并没有明确以吴派、皖派来命名。吴、皖分野最后之成立，乃不得不表梁启超的贡献。

梁启超的《近世之学术》中言：“阎（若璩）、胡（渭）为汉学祖……其俨然组织著学统者，实始乾隆朝，一曰吴派，一曰皖派。”接下来，分别叙述了吴派和皖派的传承。梁启超此文不论是叙述的语言还是讨论乾嘉学术的分派，多有继承《清儒》，夏晓红讲到：此部分参考了“同年面世的

《馯书》重订本中《清儒》诸篇”。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亦持吴、皖两分乾嘉学术观点，并且有了更为明确的看法。他说“正统派之中坚，在皖与吴。开吴者惠，开皖者戴”，将吴派的治学特点归结为“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皖派治学则“识断且精审”，分析有条理，缜密严谨，上溯古义，又断以己之律令。他还谈到两派区别：“惠派所得，则断章零句，援古正后而已。戴派每发明一义例，则通诸群书而皆得其读。是故惠派可名之曰汉学，戴派则确为清学而非汉学。”需要指出的是，梁启超在此用“惠学”“戴学”只是为了方便叙述，他说：“吾欲叙叙一二人，以代表其余……今略述二人之著述言论及其传授之绪，资比较焉。”也就是说，通过对比具体人物的学术，能更方便、更清楚地讲明吴派、皖派各自的特点。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亦言：“汉学家所乐道的是乾嘉诸老。因为乾隆、嘉庆两朝，汉学思想正达于高潮，学术界几乎都被它占领。但汉学派中也可以分出两个支派：一曰吴派，二曰皖派。吴派以惠定宇为中心，以信古为标帜，我们叫他做纯汉学。皖派以戴东原为中心，以求是标帜，我们叫他做考证学。”

梁启超直接将乾嘉学术分为“吴派”“皖派”，超越章、刘二氏名学的拘囿。从江藩所论到章太炎的“吴”与“皖南”，再到梁启超的“吴派”与“皖派”，中经三变，乾嘉学术派别最终确立。可以这样讲，论述乾嘉学术派别问题，启自乾嘉学者本身，近代以来由章太炎首揭其槩，中经刘师培的发挥阐扬，至梁启超的反复论说，终成定格。自此以后，凡治清学史者，在论及乾嘉学术分派大都沿用此说。诚如李纪祥所说：“章氏以片段的方式论‘清儒’，但实际上却主要以惠栋、戴震为中心的论断与分析之言。偏偏梁启超被称之为中国‘近代’第一本学术史著作的《清代学术概论》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讨论‘清学’的部分，继承了章太炎在《清儒篇》中以惠、戴为‘清学/清儒’为中心的做法，而将‘清代学术史’的

史述主线形成了惠戴之学或吴皖二派为其高峰的学术史观,并且自此以降形塑了后代学人对清学的认知。”

### ◎ “吴、皖非分帜也”

同样谈乾嘉学术,同样谈惠栋、戴震,钱穆的看法则与以上三位不同。章、刘、梁根据治学特点“信古”“求是”,将乾嘉学术分为吴派与皖派。至于两派之间的关系,章太炎鲜有论及。梁启超于两派之间略有论述,仅言“亦在师友之间”而已。他说:“其实各派共同之点甚多,许多著名学者,也不能说他们专属哪一派。”倒是刘师培谈到了两派之间的交流:“当此之时(嘉道年间),江北学者亦见异思迁……拾常州学派之唾余以趋时俗之好尚,此南方学派输入江北者也。而江北之学亦有输入南方者,一曰闽中学派,一曰浙中学派。”遗憾的是,刘师培从学术发展的状况上谈及吴皖两派发展到嘉道时期时始有交流,对此前两派之间关系认为乃是难分伯仲。

钱穆正是从此三人忽略之处着手,深入考察惠栋学术对戴震的影响,提出了“吴皖非分帜”的观点,从而将研究引向深入。钱穆考察戴震游扬州后论学态度的转变,言:“东原于乾隆丁丑南游扬州,识松崖于盐运使卢雅雨见曾署,自是客扬州者四年。东原论学宗旨,其时以后盖始变,此可以集中《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一篇证之……东原是文作于乾隆乙酉,而议论与前举已大异。其先以康成、程、朱分说,谓于义理、制数互有得失者,今则并归一途,所得尽在汉,所失尽在宋,义理统于故训典制,不啻曰即故训即典制而义理矣。是东原论学一转而近于吴学惠派之证也。”又引用戴震为余萧客所作的《古经钩沉序》,进一步论证惠栋对戴震治学的影响,最终得出扬州游学之后,戴震治学近于惠栋的结论。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原因在于钱穆认为吴、皖学派渊源不同,“戴学从尊宋述朱起脚,而惠学则自反宋复古而来”,并且认为汉学家诋毁宋儒“盖

乾、嘉以往诋宋之风,自东原起而愈甚,而东原论学之尊汉抑宋,则实有闻于苏州惠氏之风而起也”,以此来说明戴震对惠栋的继承。钱穆还进一步阐明“惠主求古戴主求是并非异趋”的观点,他说“舍古亦无以为是”,即丢开了六经就谈不上求是。戴震所追求的义理也没有穿凿附会于古经之外的言论,所以“惠、戴论学,求其归极,均之于六经,要非异趋矣”。又引用江藩的话进一步佐证惠、戴治学并非异趣,“江藩《汉学师承记·洪榜传》,称榜为卫道儒,又全录其与朱笥河发明东原论学一书,可证其时不徒东原极推惠,而为惠学者亦尊戴”,从而得出吴、皖非分帜之论。

钱穆正是看到吴、皖两派之间的联系,乃将乾嘉学术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也正因如此,为后来学者的研究开启了新的视角。20世纪50年

代,侯外庐在沿用吴皖分派的思路提出了:“戴学在思想史的继承上为惠学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陈祖武指出:“戴学之继承惠学者,为训诂治经的传统……离开文字训诂,乾嘉学派将失去依托。故吴、皖分野说虽注意到惠、戴为学的差异,却忽略了其间的根本性,这就不合乎历史实际了。然而,戴学毕竟发展了惠学,它并不以诸经训诂自限,而只是以之为手段,去探求六经蕴含的义理,通经以明道。”暴鸿昌指出:“清代乾嘉考据学虽自成流派,然于内部无流派可分。如强为之分,于事实不符,必牵强附会,使一些考据学者被迫归队……汉学家实一治学宗旨,同归一个流派。”这些论述为乾嘉学术研究向纵深方向推进,突破了吴皖分派的旧格局,注意到乾嘉学术的前后相承以及学者之间的治学联系。

### >>> 结语

乾嘉学术吴皖分派问题,从章太炎首揭其槩,到刘师培进一步阐发,再到梁启超反复论说终成定格,钱穆提出“吴皖非分帜”,并将此命题推向深入。此论点对后人影响深远,今人所论分派或不分派、分两派或分多派,大都没有跳出近代学者所讨论的范围。笔者以为,一是在研究乾嘉学术时,应将此四人的观点综合起来,既谈到两者的区别,也看到联系;既揭示乾嘉学派内部的治学迥异,又谈到乾嘉学术的发展演变。这样既能把握乾嘉学术的整体面貌,又能了解乾嘉学术的发展演变。“吴皖分帜”与“吴皖非分帜”是学者以不同的视角来看待乾嘉学术,一个更多关注学术内部的不同,一个注意到了学术内部的联系,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为我们以后的清学史研究开启了不同的门径。二是既然吴、皖分派已经成为当今学术界对乾嘉学术的普遍认知,也就说明这种分法是有道理的。张之洞曾言:“读书欲知门径,必须有师,师不易得,莫如即以国朝著述诸名家为师……知国朝人学术之流别,便知历代学术之流别。胸有绳尺,自不为野言谬说所误,其为良师,不已多乎?”也就是说,张之洞为初学者列出本朝诸多名师,初学者按照师承关系逐渐了解了这一体系或者派别的学术情况,从而对本朝不同地域、不同家法、不同师承的学术派别有了基本的辨别,即“胸有绳尺,自不为野说所误”。吴、皖这种学术分派为初学者指引了门径,提供了易于把握清代汉学的基本谱系和大致脉络。三是在对乾嘉学术有基本了解之后,再深入研究时,若再严分吴皖,就不太合适了。因为乾嘉时期的学者联系密切,互为师友,有些学者更是左右兼采,其派别区分并不明显。桑兵谈派分问题时说:“过度的简约化在提供清晰得近乎虚假的脉络和泾渭分明的界限的同时,牺牲了大量错综复杂的事实。”我们应该跳出分派的藩篱,注重学者之间或不同地域之间的学术联系,注重对围绕核心逐层外扩的松散梯次结构的全面考察与把握,注重个体分析与群体分析结合起来,将乾嘉学术的研究推向深入。